

“放” “鳴” 選輯

(第二輯)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

广东省高等教育局資料工作組編

1957年9月

PDG

前 言

为了配合广州市各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我局会同各校馬列主义教研室同志將大放大鳴中教师和学生的錯誤言論進行选輯，陸續編印成小冊子，以供各校教工学生學習参考。本輯是学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

編 者

1957年9月

目 錄

華南農學院園藝系研究生

郭昌華在該院小組會上的發言…………… (1)

論肅反擴大化……………華南師範學院地理系王文治 (14)

再論肅反擴大化……………王文治 (16)

給胡耀邦同志的信(摘錄)……………華南師範學院機械系何烈良 (26)

不僅要求克整風而且要求

整個社會整風……………中山大學歷史系學生(姚紫楓) (23)

社會評論敷衍……………中山大學歷史系黃溪賢(歐陽龍) (25)

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

廣州比不上香港……………中山醫學院胡賢德 (28)

駁“人民日報”社論……………華南師範學院“幾個和平人” (31)

馬列主義只是階級偏見

把黨團員都打下地獄去……………中山大學物理系陳京 (32)

蜘蛛……………廣州師專附屬中學 (34)

“還我河山”……………華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徐道衡等十八人 (35)

要求改變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組織有國民黨

參加的聯合政府……………華南師範學院“幾個愛國者” (37)

是不是人民對黨領導的

軍隊沒有意見……………華南師範學院政研 (38)

海風在“放”“鳴”中的詩……………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李聯鈞 (41)

華南師範學院學生楊天民

在“放”“鳴”中的一些言論…………… (42)

給林希翎的一封信……………華南師範學院莫旭(莫朝發) (44)

廣州師專中文科學生俞保球

給他朋友的一封信…………… (46)

華南農學院園藝系研究生郭昌華

在該院小組會上的發言

過去我不想講，怕人家說落后，不配團員稱號。現在消除了顧慮，還是講了好。

1. 緒言：

解放後我自己對政治非常消極，想離開學校，生活在一個僻靜的鄉村，盡量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去為鄉村的人做些好事，想把自己的一生消磨在荒無人煙的僻壤里。

在俄語教研組時，我對工作就感到沒有興趣，後來曾經對做研究生甚感興趣，但由於政治情緒低落，厭倦了政治生活，造成對研究生的學習也提不起勁來。這些原因是由於解放幾年來的感觸，和所看到的一些現象，使自由積極到消極，從朝氣勃勃到暮氣沉沉。

2. 對黨中央的政策發生懷疑：

黨過去工作有錯誤，但黨總是不肯承認共產黨的政策有錯誤。

(1) 肅反運動

我對肅反的看法是：運動本身，只是抓住一點不可靠或不完整的材料，就用粗暴的辦法，鬥爭出“反革命”來。這是全國性的錯誤，這是對人民採用鬥爭的政策，既然這些被懷疑的人都還不能確定他們是反革命分子，那就不能採用鬥爭的手段。

肅反在人民內部進行，黨沒有考慮到會傷害到人民，斗

爭的根据是很少的，有的人只要認識一个特务，或者同住过，就要被斗，我虽然沒有被斗过，但是很可怕，随时都有被斗的危險。

恐怖的斗争伤害了我的身心。每当我想起无辜被斗争的人，在肃反中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人，我为可憐的青年妻子和还没有長大就失去父親的孩子不知流過多少次同情的泪，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給他們帶來的不幸。

在东北时，学校展开肃反运动。全校学生在肃反中有兩——三周失去自由，早上起來就坐在教室檢查思想，一直到晚上。我曾想公开破坏，反对这种違反社会主义民主的做法，或者在教室内拍枱大罵，宁可去坐几天監獄还比这种精神的折磨来得痛快得多，但考慮到自己又是团员，曾經举过手宣誓要做党的助手，自己不但沒有積極支持这个运动，反而起來破坏，我想到这里，我懊恼我自己是一个团员，致使自己没有反对这些不人道运动的自由权利。

从东北到广州旅途經過北京时，我順便到我弟弟的学校去一趟。他校的肃反被中央批評没有任何的斗争性。結果重新再搞。刚开始不久，一位年青无辜的青年就自殺了。

这說明：北京是毛主席所在地，也是同样的做法。

在農学院我听了杜院長的檢討，知道所斗的人有10几位是錯了的。由此看來，斗争的准确率是非常之低，斗錯的占絕大的比例。而毛主席却說：我們的肃反斗錯的是有，但不多，只有一点点。这无非是用主席最高的威望來掩蓋錯誤，模糊人們耳目的做法。由于肃反錯誤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这充分地說明是政策帶來的錯誤，絕不是个别党员的錯誤。

在肃反中有被斗錯的人來对党员申訴，得到的回答是：

“在偉大的运动中，个人的委屈有什么了不起。”最初我觉得很有理由，我也学了这一套，还对一个同学說了，可是講完后，又觉得这不是真理，如果抗美援朝战争，受伤了，自己看到伤痕，会想到自己为人民而流血，可是当自己想到自己的血是流于无辜，这在思想上是很难磨滅的。

我怀疑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如果是偶然性的不可避免的錯誤，那是可以原諒的，但是肅反这些政策的錯誤，是不能原諒的。这一点沒有战斗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農科所一个青年技术員發牢騷，說怪話，反映出社会的真实情况，这才是真实的。可是在党团內是不能發牢騷的。否則就被扣帽子。由此可見，党团员是不能反映出社会现实的。

这个青年技术員的同房有一个特务，結果两个青年技术員都被当特务來斗争了，而且两个都无辜入獄了，他們很憤怒，其中一个在獄中絕食，結果餓死了。我內心很难过，这种責任是誰負的呢？而党总结却說：“此人无罪。只是在獄中病死了。”

人的腦子不是鉄，事实在腦中是永远不会磨滅的。我認為党中央決定这种不人道的政策是不應該的，故意这样做，認為做錯了再認錯，預先布置好肅反后就來平反，安慰安慰，这是兩面派做法。一切在肅反中犯过罪过的党员，甚至毛主席也要为他所領導的党在人民中做下的罪过流泪致哀。但可怕的事，是政治把人离开了人性，人类的憐憫和同情已經在党员身上逐漸消失，不但沒有为自己的罪过而悲痛，相反地用种种的大道理來为自己的罪过辯护。

②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

肅反運動後，我思想起了很大變化，引起了對解放後黨的全部工作從新估計。三反、思想改造運動，是用人格上的污蔑，是用強制的手段來進行思想改造。當時毛主席對進行思想改造的英明理論為什麼無影無蹤呢？整風一開始就搬出一大套毛主席的創造性理論——“和風細雨”，這說明黨對別人殘酷鬥爭，對自己則“和風細雨”。馬列主義用來說自己的時候樣樣都對，講到別人時樣樣都不對。我認為每一個還認為自己是黨的黨員，在運動中打過人的，應該自己自動地跑到被打過人的家，要求他還打；要到死者的家，承受死者家屬對他一切的責難。人性在我們的國家毀滅着。

三反、思改中，首先布置工人、學生說：“請你脫下鞋子，洗個澡吧”等許多侮辱的話，來侮辱受人尊敬的長者，鬥爭時點老師的名，要老師低着頭。現在黨整風，說毛主席英明，搬出“和風細雨”的辦法，但是思想改造卻用粗暴的壓制的辦法，強迫別人承認，使被鬥爭的老師不得不擴大缺點和錯誤。

事實上在人們思想中起着根本變化的，不是三反而是系統的理論學習，三反運動造成了解放幾年來產生學生對老師的普遍不尊重。

記得抗日時候，有尊師星期日，學生自動上山檢柴給老師燒，幫老師克服困難，替先生椿米，挑水，挖地種菜等。這是國民黨時代。在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國家的華僑，當他的老師回國後都經常將他自己薪水的一部分寄回來給先生用。

我懷疑是否所有的老師都不好呢？不值得學生尊敬呢？而是學生的黨團員認為自己高人一等，許多學生見了我，還是我先向他們點頭，學生認為老師是按勞取酬，教得好壞反

正是賺錢，教學生是老師應分的，這有什麼值得尊敬。祖國幾千年來尊師的傳統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受到了最大的毀滅。當我在俄語教研組工作時，曾經屢次發生過如下的事情：將近期考試學生以班會名義討論通過，要求教研組或授課老師停課，給他們溫習其他的功課，這真是氣死我。到底是班會領導教研組還是黨支部領導教研組，那些學生認為自己思想進步，可以指導老師，還說這是班會討論通過的。（有的早在15周就提出這個要求）

3. 國家的政治制度還有許多問題

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优越是必然的，但是我們國家中許多制度都是不合理的。

（一）民主制度：

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是用捏造、欺騙、夸大的手段來進行歪曲現狀，使人們看不清事物的本質；我們國家的報紙，採用強調好的一面，典型的一面，壞的一面一律不講，同樣地也是使人看不清事物實況的情況。

記得在哈爾濱時，黨委為了使學生了解解放後農村生活提高的情況，作為証實農村合作化的优越性，最初首先組織一批黨員干部到哈市郊一個最典型的社去參觀，這批人回來後就大談优越性，說一個合作社里有許多農民有收音機，生活水平又多高，土分高等等，許多使我致疑的地方。我自己是在南方的農村中長大的，我絕不相信土改後農村生活真的就有那樣多的改變，求知和辯明真理的欲望使我積極的爭取，終於得到到該合作社去參觀的機會，結果呢？東北的農民的生活水平和南方的一樣都還是非常之低。生活的提高並不是那樣的理想，同時發現了一個真理：“單幹合作化不可

能根本改善農村生活的水平”。在社中發現如下事實，和黨團員宣傳的完全兩樣。

(1) 生活水平很低，吃粗糧，沒有青菜，一年都吃不到幾次肉。他們用玉米粉做皮，內包豆沙為餡，用這又粗、又酸、又不好吃的東西作為來迎接我們從城市來的貴賓。

(2) 工資分高，比單干戶收入多是從那里來的呢？政府用給合作社以全力支持，對單干戶置之不理的做法來顯示集體化的優越性。肥料貸款，單干少；冬季，政府介紹合作社的馬車到基建土地去“拉碼頭”，而單干戶沒有享受這樣的優先權利。這一方面的收入是非常大而有利的。事實上農產品產量的提高和副業收入尚沒有顯示出很大的集體化的優越性，政府分配給他們種的甜菜面積很大，而單干戶只准種糧食。

(3) 農業生產存在嚴重無法克服的困難：(a) 蔬菜栽培：種包心白菜採用“直播不灌溉，撒下種后等收穫”的做法，雖然面積不小，但可以肯定是徒勞無功。(b) 副業生產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養豬業表面看發展遠景不錯，規模大，但按技術力量配備的條件和技術員的水平來看：將會嚴重的失敗。瘟疫開始，農民只好站在舍房看牠死，也無辦法。養雞，以購買小雞的數目來看很多，三、四千頭，成活率是千分之四、五，多的千分之几十；他們買了第三批的小雞回來養，每批都一兩千頭，但飼養員指給我們看第一批的（最大者）只剩下幾頭；第二批只剩下幾十頭，當中還有得病臨死的幾頭；第三批兩千多頭，剛買回來的，每天以幾十頭的死亡率發展着。要根本解決農民的生活水平，在技術力量的裝備沒有提高和加強以前，僅僅是一個幻想。

(4) 那樣多收音機那兒來的呢？沒有一架是農民在生產上的收入購買的，是兒女在外工作，從城內買回價極低廉的日本式舊收音機。

(5) 再看農民對知識分子的感情，離別時有些農婦拉着我們的女同學哭，是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呢？不是。她們看到我們的姑娘活潑可愛，穿的好，住下幾天就給他們一元一元的大票作為生活費，他們看到我們的鈔票成疊，看到城鄉生活有天地之差，我們走了就再不會有更多城里人再來了，他們的窮苦生活就沒有誰知道，沒有人會同情。他們哭是為了訴苦，她們哭是為了怕我們不知道他(她)們的苦。我們上車時，全村的人都出來送行，事實他們是來看熱鬧、看汽車。

(二) 劉少奇說過，我們認為農村的生活比城市生活低，只不過是由于住在城市中的人喜歡吹牛。廣州市郊農民每家都有一架單車，這不是真正農民的代價，希望政府組織真正的民主人士下到真正的鄉村去看看，報紙中所發表的農村情況，不是真正的情況，只談農村發展的遠景，沒有談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可憐的農民沒有一個人為他說話：他們住在原始的生活中也不知道如何向政府爭取自己的利益。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有許多虛偽的東西掩蓋着農民的苦痛。

(1) 報紙不登載反面的東西，不登美國、國民黨的文章，我們是同意的。但是人民中相反的意見都沒有發表的機會，對政策反對的意見沒有發表，真正為農民痛苦的呼聲絕迹。光明日報最近發表一編“教授治校”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的隔鄰立即布設一篇反對的意見，這些都是說明了我國吹噓的社會主義民主。

(2) 民主黨派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沒有獨立政治見

解，只是举手拥护共产党而已。民主人士也这样说：“我们是帮助党工作的”。对国家的政策，过去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其实有很大意见到现在才揭发出来，这是我国多党派国家的实质。为什么没有一个年青人想人民左党派呢？这是因为这些党事实上不是党派，而是共产党对不同的各阶层人民的教育机构，是学习党政策的机构。

(3) 许多国营农场中的场长、队长、组长都是党员，其实什么也不懂；学校中每系都有一个党员秘书，名为协助系主任，实则是说系主任思想不成，需要一位党员在思想上来领导系主任工作，造成党团员的优越感。

(4) 国家教育制度存在着非常可怕的现象。初中升高中没有考试时就进行调查，家在什么地方，如果有地方劳动生疏，就不能考上高中。如果有一个学生说：“考不上我回家生产”，那个同学一定考不上，城市中干部的子弟，不用考就会保送，中央干部特别设立一个子弟学校，其实里面的学生有的根本就不想读书，书念得很糟，但因为他们是人儿子却有书读，同时还要教员保证他们书读得好。我怀疑这是上级市置的。农民的子弟很困难上学，农村的小学很马虎，很糟的师资都在农村，经费少，学生的质量很低，很难和城市比较。因此农村的子弟不能上中学，这就等于排挤农民子弟一样。初解放时农民的子弟能上一些大学，而现在就要逐步淘汰，虽然权利均等，实质上是农民子弟的升学（小学——初中，初中——高中）存在很多困难。看样子，农民的子弟，子子孙孙只有拿锄头耕地了。

农民的子弟在升学的竞争中被迫赶出门口，农村的人口众

多，但農村中的學校數量遠遠地落後於城市中學校的數量，難道農民是還沒有開化的中國人民不需要讀書嗎？這難道是公平的待遇嗎？

合作社勞動力大量过剩，技術很低，副業生產有的地區發展很困難，有的根本不可能，小學生、中學生動員到農村去，認為是知識分子下鄉，事實勞動力又弱，以他們的知識水平又能解決什麼問題，這些絕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不但沒有知識，連常識都無。我懷疑中小學生到農村去會起些什麼作用，甚至最簡單植物常識都沒有，造成什麼小麥和蒜頭嫁接都是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在農村中搞的笑話，如果要使中小學生真正地在農村起作用，必須改變目前的教育制度，在中小學設農業課，或者由農學院學生去作校長，同時要大大減少普通中學，在農村中大量設立初等和高等技術學校才會對農業生產起很大的作用。

如果估計不能全部升學，則將普通中學改為農業技術學校，畢業後即刻可以起作用，否則中小學生畢業後不能升學，到農村，一方面沒有體力，二方面在農業常識上不如一般的農民，又怎能起作用呢？

5. 糧食政策問題

農民吃不飽，生活水平高的人才能吃得飽。按中央布置下來，從北到南，大家一擠，必然會使人吃不飽，因為這種的做法是反科學的。

糧食政策本來是節省糧食、達到計劃供應的目的的，但是糧食只在集體機關有浪費，農民一般是很少浪費的，他們是關心五穀的。糧食政策下來之後，浪費的還是浪費。

糧食不能用來喂豬喂雞，違反的可以用辦法來處罰，用

糧食政策來解決是不好的，這就使人吃不飽。

這種政策措施，本身存在着嚴重地反科學的地方。這些不合理的政策措施給自己的人民送到飢餓的邊緣，這說明政策的制定是由主觀、宗派、和不民主所造成的。我要求以後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通過全民投票通過。人民對政府沒有充分的監督權利，最終吃虧的還是人民。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加強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是杜絕錯誤最根本的措施。只要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三害才能及時的撲滅。整風只不過是給改進錯誤指出方向。改革才是杜絕三害的根本。

（6）豬肉供應問題

廣東豬肉最困難的一段時間，首長曾經做過報告解釋供應困難的真正原因，其實我認為主要原因並不是他所講的那些。在蘇聯展覽會時，港澳人士回來參觀者很多，為了造成一種政治上的影響，這時供應特多。是不是真的有那樣多的豬肉供應呢？其實廣東豬肉並沒有條件那樣供應的。當時是動員人員到廣州的鄰縣去收購，規定有100斤的都要拿來賣，以保證廣州的政治局勢。展覽會結束了，能夠殺的豬也都殺光，不能殺的還沒有長大。這樣必然造成豬肉供應的緊張。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以實踐的生活水平來顯示，為了政治局勢又何必虛偽地誇張呢？這不是實事求是。

（7）勞改問題

周恩來在報告中談到勞改問題我很同意，寫信給我弟弟動員他，（他是勞改的）他來信罵我，罵我可笑，說我在學校中根本不瞭解事理。表面的理論對他沒有任何幫助。有一次我有機會到勞改農場特地對勞改問題作了深入了解。我所看到的一切和周總理報告所說的完全兩樣。食的很不好，

过度劳动，劳动不好要强迫去做，劳改的很多要逃跑，逃跑的追回来就吊起来打。病了，生活等许多条件都非常坏，更谈不上什么教育。干部对劳改犯态度很坏。

“劳改场我过去认为是犯人的学校。在这里学习，教育他们。报纸也说得很好，说替他们找工作，这我是很怀疑的。好人在各个城市中失业还很多，这些人民政府还未能照顾，那有这样好替劳改犯找职业？”

馬小彦事情，在全國各報大吹大擂，請問究竟象馬小彦这样的劳改犯有多少呢？是否能找到职业呢？现在听说要将劳改犯遣散回家（其实别人一看案情，看见是劳改犯就不要），这说明只是共产党的宣传而已。培养典型，拿个别的现象夸大成一般的。其实在北方的劳改农场冬天冻死的、病死的更为普遍。期满了释放出来仅剩下一个尸体，染上满身内病的就算是幸运了。

我现在看文件、报纸就都要估计一下，能真正反映现实情况有多少？调查调查看看，有空就下乡了解一下，其真实情况如何。在我院教工中生活就有很多奢经，教授的生活很好，又有纱窗。到第一宿舍的公共厨房看看，苍蝇极多，其福利差这么远，同样是学校干部，家属，生活的待遇就有很大的差别。农场工友的生活条件就更差一筹。

有一次造林，我到一农场工友家去食饭，我食饭非常勉强，苍蝇很多。工友的生活也没有人照顾，好象领导的眼睛永远都是朝上，下面的东西不闻也不见。学校的领导干部稍为向下看看就可以解决。农场的积肥方法非常不好，从没有加粪。第一教工宿舍还不能照顾，农场工友更加没有照顾了。

在我們國家中，看來有些人似乎是注定該死的一樣。深入了解農村生活的人也是很少的。

（8）民主制度（補充）

在黨內也是有問題的。黨內有些人的思想是有分歧的，有些人認為要稍為照顧農民的，他們的論點從沒有在報紙上發表，在黨內發表了就扣帽子說有些人要想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究竟這些人是否真的企圖否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呢？誰也不知道，在黨內也一樣，很顯然，跟幾個執政的頭子有反對意見也是得不到在黨內自由發表的地位。就算要工業化，但是對農民也應該要注意一下的。

對這些不同論點的人的文章從無發表，這可能是他們從鄉下出來，見到城鄉矛盾大，相差遠，才提出這種論點，他們也不是不要工業化這麼傻的。

對斯大林功過問題也很簡單的討論，其內中問題完全不知，只發一篇論共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就要人家承認斯大林的功是七過是三的說法。聽說斯大林曾在蘇聯實行過象法西斯一樣的手法，很多共產黨員也拿出槍斃，只簡單的來說討論討論，這使人的頭腦簡單化，沒有獨立思考，從文章上讀了一遍，就重複文章中的幾個字大發表感想。多說黃明的人，就認為進步。

（9）不進黨

我聽過基督教，後來找不到真理，後來認識黨，要求進團，但是不想進黨，我不能無條件執行黨內錯誤的東西。

以前我認為整風沒有什麼搞頭，提提意見，檢討檢討就了事，因此不想提意見。見杜院長講話後還有一點決心，所以這次才稍稍提些意見。

(10) 我对这样整風有意見

我对整風有如下意見：羣众提意見是帮助呢？还是監督呢？党是执政的党，它的錯誤殃及全民，过去的錯誤又是嚴重的，如果人民对自己的政党沒有監督的權利，今后吃虧的还是人民自己。

現在看起來要磨牛角尖了，对人問題不敢爭論。

是否要“教授治校”，我認為要看內容而定，但是要提醒注意，必須內行人才能治校，不能打游击几年的人才能來治校，光明日报發表了一篇就压下去了。

目前黨員的水平很低，必須加強羣众監督才行，过去也反过三个主义，但是都被压下去了，只有把羣众对領導監督的制度充分地完善起來，才是真正杜絕三个主义的 根本办法。

（華南農學院院刊副刊1957年7月5日）

論肅反擴大化

華南師範學院地理系學生 王文治

証据：1.就我院來說有不少部分人被誤作當時的鬥爭對象，冤枉和懷疑了一些好人。同學們听了當時黨委的報告后，便疑神疑鬼，好象周圍的人都不大可靠。就全國來說也冤枉和懷疑了不少好人。有人說：“肅反運動并未擴大化，其理由是冤枉了一些好人，但尚有少部分反革命未肅清。運動不能搞得十全十美，因此算不得擴大化。”如果被冤枉和懷疑的好人人數為 m ，未被查出來的反革命人數為 n 的話，那末， m 大於 n ，這不是擴大化是什麼？當然，機械的計算中不甚妥當和全面，運動的效果不能用數學的方法計算。但從這一計算中也可以看出一部分問題，如果大家認為以上事實不能成為肅反擴大化的理由的話，則請看下面一條：

2.當時人民日報社論運用“社會主義建設愈成就，階級鬥爭愈尖銳，反革命分子破壞愈凶”的理論指導肅反。1955年的中國的反革命分子真的是愈來愈較往年凶而多嗎？答曰：不然。當時資產階級虽未完全改造好，國內民隱藏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并不意味着反革命愈來愈凶而多。黨中央說：全國90%以上的人是好人，百分之几是反革命分子，這百分之几，到底是百分之几呢？姑且算作百分之一吧，全國六億人則有600萬反革命分子，那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呢？因此，我不同意當時黨中央關於指導肅反的理論（人民日報社論即代表黨中央發言）和在這一理論指導下，說全國有百分